

李光灿 杨景凡 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人物评述

论 孔 子

作者 杨景凡 俞荣根

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丛书

论 孔 子

——中国法律思想史人物评述之一

作者 杨景凡 俞荣根

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书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孔子的生平事迹	(5)
身世	(5)
志于学	(7)
从政	(15)
出游	(23)
归 鲁	(28)
二、孔子的仁学	(32)
1. 仁——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学说	(33)
2. 《论语》的仁论	(41)
3. 仁与礼	(57)
4. 从仁学看孔子	(69)
三、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和问题讨论	(74)
(一)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	(76)
(二)几个问题的讨论	(94)
1. 孔子不反对法	(94)
2. 孔子反对铸刑鼎不是反对法	(99)
3. 礼治和“法治”	(114)
4.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伦理法律思想	(128)
四、孔子的法律思想 (之一)	(133)
民本主义	(133)
家族主义	(137)

君主主义·····	(148)
理想主义·····	(160)
五、孔子的法律思想(之二) ·····	(164)
1. “正名”的立法思想·····	(164)
2. 先富后教的教育预防理论·····	(167)
3. “为政在人”的“治人”主张·····	(177)
4. “中庸”的刑事政策·····	(184)
5. “原心论罪”的刑罚原则·····	(193)
6. “父子相隐”的诉讼原则·····	(199)
7. 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	(204)
〔附录〕 ·····	(208)
1. “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	(208)
2. “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	(210)
3.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212)
六、孔子的法律思想(之三) ·····	(215)
七、孔子的法律思想与中国封建法律 ·····	(223)
结束语 ·····	(233)

引 言

孔子，是我国二千多年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人。他受到的褒贬却起落异常。他曾得到过显赫的封号和最隆重的祭祀，也遭受过掘墓砸碑的厄运。

孔子，是最难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至今莫衷一是。

孔学，在春秋时代就是显学。这以后，它有过时髦，也很倒过霉。时髦时，帝王顶礼；倒霉时，垃圾不如，学者遭殃。

但孔子研究，二千多年来竟然延绵不断。它曾是一个著述最丰的领域，也曾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它在人物研究中的历史最为悠久，也会在今后延续下去。时间的长短，未敢逆料。

.....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民族面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将在胜利后建设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号召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他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十五年过去了，这个任务我们完成得怎么样呢？

现在，我国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期，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十分必要的。前不久，匡亚明同志写了题为《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的文章，他认为，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民族遗产，“就必须从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开始”，这里，“要的是冷静的科学研究，拨开迷雾，给孔子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合理评价。承继这份珍贵遗产，是学术界的任务，是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光明日报》1982年9月13日）

学术界多有持相同的见解的，我们亦很有同感。

历史上，孔子曾被封建统治者们长期神化。这个神化了的孔子，是权势者们用来压迫人民、奴役人民、欺骗人民的一尊偶像。孔子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鬼化。这个鬼化了的孔子，集小丑、流氓、白痴、教唆犯、刽子手、复辟派……于一身，成了中华民族的败类和罪大恶极的元凶。但是，万能的偶像的孔子和万恶的罪人的孔子，都不是真孔子。

过去，我们已知道，政治野心家们可以通过“尊孔”，把孔子变成自己进身的一块敲门砖或护身符。十年动乱中，我们又看到，“反孔”，也可以成为另一伙人的登龙术和跻身“夺权”班子的阶梯。

历史是无情的。多少热衷于祀孔、祭孔、追封孔子的封建帝王、军阀官僚，都一个个被历史长河的波涛卷走了。企图靠“反孔”捞取政治资本的当代野心家们也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嘲弄历史的人最终被历史所嘲弄。孔子不是一个神，也不是一个鬼，而是一个人。神化和鬼化，“尊孔”和“反孔”都违背了历史，都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民族感情。我们需要的不是“尊”，也不是“反”，而是科学地研究孔子。现在，一门超肤色，超地域，超社会制度的世界性学问——孔子学，方兴未艾。中国的孔子研究者们应当拿出更多的具有新水平的成果来。凡是有爱国心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历史紧迫感，都不会容忍我们在这个占有优势的领域中观望、落后。

那种一听到要研究孔子，一看到孔子研究的文章多了几篇，就惊惶失措地以为“孔老二阴魂不散”、“余香袅袅”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研究孔子，是尊重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古老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是承认他给我们民族的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心理素质、伦理观念、道德评价、法律意识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而这些贡献和痕迹，不论其积极方面，还是其消极方面，又都和当前的运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交织在一起。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孔子，就无法深刻地了解中国，把握中国的国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学术研究领域春色昭灼，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的工作，一定会发展和得到预期的成果。

这本小册子不可能对孔子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我们的初步设想是，从法律思想的角度探研孔子思想的一个

侧面。由于过去一度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干扰，孔子法律思想的研究竟成了禁区中的禁区；由于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一伙鼓噪一时的“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礼治反动论”、“复礼即复辟论”、“人治与法治对立论”的黑帮史学观点的控制，社会上，乃至学术界谈孔色变、谈礼色变，孔子法律思想研究领域成了冲击的中心，因此，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冷清的领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宏伟建设中，研究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孔子研究，应当是它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正由于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的薄弱，因而我们的研究不能不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但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却是我们法律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我们愿作野芹之献，求教于孔子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孔子的生平事迹

无论是封建时代的神化孔子，还是“四人帮”的鬼化孔子，都首先在孔子的出身、生活经历上大作文章。一位死了二千多年的古人，所留下的生平事迹的可靠资料不多，而且有的又真伪难辨，这就使神化和鬼化的伎俩似乎都有了施展的余地。不过，孔子总究不是仅仅存在于人们梦幻中的鬼神，因而，尽管蹩脚的画师可以画出活灵活现的鬼神，但他们要把孔子画成神或鬼，却没有一个成功过。对于孔子的生平事迹，从清代以来，许多学者作过认真考辨，其基本线索已理得比较清楚。为了有助于探求他的法律学说，我们撷取过去和当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一简略的介绍和辨析。

身 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昌平乡陬邑人（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生于公元前 551 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岁。^①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据说还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的嫡系后裔。周公东征，平定武庚的叛乱后，微子受封于

^① 从《史记·孔子世家》说。《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则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比《史记》早一年。我们不必深究。

宋，后传至宋闵公，其世子弗父何即孔子先祖^①。弗父何让位于其弟宋厉公，其曾孙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君（《左传》昭公七年），世为上卿，显赫一时。但这个世卿世禄的家族很快就在贵族之间的政治倾轧中败落下来了。正考父之子孔父嘉被宋国另一贵族——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之后三世，就是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孔防叔畏华氏而避居鲁国，改姓孔氏。孔子的父亲陬叔纇（《史记》作叔梁纇）是鲁国下级武官，曾立过战功^②。

叔梁纇元配施氏，生有九女，妾生子孟皮，却是个跛子，乃复求婚于颜女征在，时纇已逾花甲之年而颜征在尚是妙龄少女，双双祷于尼山以求子嗣，后果生孔子。相传孔子三岁丧父。《礼记·檀弓上》谓其“少孤”，《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说明孔子的父亲已是一个破落贵族，他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到贵族的血统、地位、金钱和官爵，自己也不曾做过世卿贵族之家的纨绔子弟。曾有一段时间，有的文章总是升高孔子的出身成份，并以此推定其政治立场必然反动，其实是不符合客观史实的。这种做法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态度。

①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七年传注。《孔子家语》谓弗父何为宋襄公子。

② 《左传》襄公十年：晋、齐、鲁、宋、卫等国联军进攻一个姒姓小国偃阳，“偃阳门启，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郕人纇抉之，以出门者。”

志 于 学

鲁国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的封地，到春秋时代，虽然政治上日趋衰弱，但却是一个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物，文化素养较高的诸侯国。相传吴国贤人季札到鲁国，聆听、观赏了周乐，禁不住连声赞叹：“美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看了鲁国保存的《易》、《象》与《鲁春秋》，也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生活在这样一个酷爱文化的社会环境中，从小受到了潜移默化。《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以后，孔子就首先以“知礼”闻名于世，所以，鲁世卿孟僖子称孔子是礼学的“达者”，留下遗言，令其二子师事孔子，“而学礼焉”。①

但贫穷出身的孔子终于成为一代学问大师，除了社会的陶冶，更靠自己主观上的刻苦努力。孔子晚年追述他一生的学习、成长过程时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为政》）

十五岁就“志于学”，说明他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这句话的意思本来是比较清楚的，可历代经学家们为了神化孔子，偏要作些离奇的解释。他们说，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说自己十五而“志于学”，为的是“隐

①见，《左传》昭公七年，《史记·孔子世家》。

圣同凡所以劝人也”^①。这真可谓是臆想说经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志于学”就是“志于宦”或“志于官”。如蔡尚思先生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说，孔子的“十有五而志于学”，“实际是说从十五岁那年立志要做官”，“可见孔子说志于学，与志于仕或志于宦，意思一样。”^②粗略地查了一下，《论语》论学共四十一章，学字五十三见，都是学习，学问的意思，没有一处可解作“仕”或“宦”的。因此，若单独把“志于学”一句中的“学”字解释为“仕”或“宦”，显然与《论语》论学的一贯意义相悖。而且，《子张》篇中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已明确将“学”和“仕”区别运用，若把这句话中的“学”训为“仕”，就根本无法读通。

“志于学”也不限于“学习做官的本领”^③。《论语》中，“学习做官的本领”有专门的用语，叫“学干禄”。《为政》篇“子张学干禄”章，就是子张向孔子请教“做官的本领”，正因为它与一般意义的“学”不同，所以，在“学”字后面加了“干禄”两字加以限制。当然，孔子教弟子学《诗》，学礼之类，也与提高做官的本领有关，但其内容毕竟比“学干禄”广泛得多。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又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鼓励门弟子们专心学习，做个“学而

① 邢昺《论语疏·为政》。

②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第8页。

③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第8页。

忧”的“士”。他自己曾以积极救世的态度争取从政的机会。他办学的直接目的，也是企图为统治阶级造就一批具有德识才学的人才。这些都说明，孔子把求学看作是求仕的必要准备。但孔子鄙视一味求官的斗筭之士。对于仕，他的态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孔子也以这种态度教育和影响他的学生。他曾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意思是：应当担忧的不是没有官做，而是一旦做了官却不能胜任，无所建树。又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赞扬专心致志地读书而不斤斤于禄位的学习态度。《先进》篇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批评子路是害了人家的子弟。子路辩解道：“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惹得老夫子生了气，骂他：“是故恶夫佞者。”假如学习只是为了做官，那么，子路的做法完全是对的，孔子应当赞成，不该如此指责。如果如蔡先生所说的，“孔子所谓学，也意味着入官府服役”，^①那么，子羔去当费宰，正是“入官府服役”，也就是“学”，孔子不该反对，子路也不该以“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反诘孔子。子路的话，正好说明孔子的所谓学，是指“读书”、求学问，而不是“入官府服役”，不是以仕代学。又，《公冶长》篇载：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孔子对学成可以做官的漆雕开不愿为官表示高兴，也可说明

① 《孔子思想体系》，第10页。

他并未把做官看作求学的唯一目的。

在孔子看来，还有比做官更高更根本的求学目标，这就是“道”。他反复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应作去）之，不去也。”（《里仁》）

“朝闻道，夕死可矣。”（同上）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上）

“吾道一以贯之。”（同上）

“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通观《论语》，孔子教和学的根本目的还是求道。

《学而》篇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张》篇载子夏言：

“君子学以致其道。”

这都明确地告诉我们，孔子的“志于学”，就是立志刻苦学习以求得道，即“志于道”。孔子从政、求仕也是为了这个“道”；如果“道不行”，他宁愿弃官不做，即所谓“无道则隐”。至于“道”的具体内容，从孔子思想的总体上来考察，就是他的“仁”。“道”和“仁”，在孔子那里是二而一的范畴。

正由于孔子把求学的最高目标定在道和仁上，所以他认为可以一起学习的人，不见得都能求得道、“志于道”：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子罕》）。同样是跟随他学习的弟子，他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雍也》），这“君子儒”，便是“志于道”或“志于仁”的学生了。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他认为弟子中称得上“好学”的，也就是颜回一个人：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

这样反复地称赞颜回“好学”，说明孔子的这一评价是相当确定的。这里的“好学”，显然不是一般的能刻苦读书，而是“志于学”，志于求道和求仁。所以，在众多的门弟子中，孔子也只许颜回为仁：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应当注意的是，颜回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如果说，学就是仕，“志于学”即志于仕，那么，颜回不应称为“好学”。孔子称其“好学”，只是因为他“三月不违仁”，具有“不迁怒，不贰过”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即学到了道，而不是由于他能“志于仕”或“志于宦”。

若拿颜回和子张作一对比，就可以进一步悟到孔子“志于学”的真蒂了。子张“学干禄”，可以说是志于仕了，但他却为孔门所瞧不起：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子张》)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张》)

可见，孔子的学生们也都以“志于道”和“志于仁”为高。所以，把“志于学”解为志于仕或志于宦，似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学，古写作“斆”，秦以后去“攴”作“學”。《说文·部》：“斆，觉悟也。”它是我国古文字中成字较早，且有明确字义的古字，《尚书·盘庚》篇就有“盘庚斆于民”。从《说文》等书来看，直到汉代，学与仕有时确实不分，但不能因此而取消学字的独立意义和独立运用。《说文·人部》：“仕，学也。”又，《宀部》：“宦，仕也。”孔颖达《礼记疏·曲礼上》在“宦学事师”条下引熊氏云：

“宦谓学仕宦之事，学谓习学六艺”。孔氏还说：“《左传》宣二年赵盾见灵辄餓，问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学也。’是学职事为宦也。”可见，宦训学，指的是“学仕宦之事”、“学职事”，是一种特定意义的学，不同于一般的“习学六艺”之学。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代事、士、仕三字通用，“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仕者，习所事也。”^①因此，仕训学，也是指特定的“习所事”，不是学的普遍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的发展，仕与学、宦与学的区分越来越明确，而这种区分，在孔子的时候已经形成，所以段氏指出：

“若《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部》、《宀部》。

《公冶长》篇“子使漆雕开仕”，注云：仕，仕于朝也。以仕、学分出处，起于此时矣。”（《说文解字注·人部》）

由此看来，古代把仕、宦训为学，指的是学的特殊意义，有其特定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并非学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古书中任何学字都应训为仕或宦，《论语》中的学和仕就不当互训。

弄清“志于学”的含义，对于理解孔子一生的事迹和思想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孔子具有孜孜不倦的求学求道精神，所以他能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的人生观，终于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他的弟子子贡说自己的老师学无常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孔子自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证之于他向少皞氏后裔——郯国国君请教有关“少皞氏鸟名官”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七年），和“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等记载，并非溢美和虚言。

郯子朝鲁在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郯国虽系鲁的附庸国，但其国君总还是诸侯一级的贵族，孔子得以见他，说明孔子此时在鲁国已有了名气。“入太庙”，诸家都解释为入周公庙助祭，这也要有相当的地位才行，所以，崔述《洙泗考信录》将它系于孔子见郯子之后，即二十七岁以上，是恰当的。这两件事表明，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已有所成就，办学也有了一定规模，基本上创立了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所以他说自己“三十而立”。